

英国后殖民文学中殖民主义“脑文本”的伦理批评

Colonial “Brain Text” in British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徐 彬 (Xu Bin)

内容摘要：殖民主义“脑文本”的核心是对殖民主义历史、文化的记忆和对殖民伦理的认同。殖民主义“脑文本”是众多英国后殖民主义作家创作的基础，也是他们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之间或妥协或抵抗的场域。英国后殖民文学聚焦前（被）殖民者及其后代受殖民主义“脑文本”影响而产生的精神枷锁与伦理身份困惑等问题。重写英国殖民史和英国经典文学作品已成为英国后殖民作家抵抗殖民主义“脑文本”及隐含其中的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英国后殖民文学；殖民主义“脑文本”；帝国主义文化霸权；重写；妥协与抵抗

作者简介：徐彬，山东大学兼职杰出中青年学者、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流散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帝国文化霸权视域下的现当代英国流散文学研究”【项目批号：18BWW0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olonial “Brain Text” in British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The core of colonial “brain text” is the memory of colonial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olonial ethics. Colonial “brain text” is the basis of British postcolonial writings and the field of compromise with and resistance to imperial cultural hegemony. British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s of colonial “brain text” on (former) colonized people and their descendants. The influences result in their sufferings of spiritual colonization and the confusion of ethical identities. Rewriting British colonial history and British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British postcolonial writers’ strategy to resist the influences of colonial “brain text” and the associated imperial cultural hegemony.

Key words: British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colonial “brain text”; imperial cultural hegemony; rewriting; compromise and resistance

Author: Xu Bin is Distinguished Young and Middle-aged Part-time Professo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 Chun 130024,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haihongjiji@163.com).

英国字典编纂家威廉·史密斯爵士 (Sir William Smith, 1813-1893) 在对拉丁语词组 “*Tabula rasa*” (对应英语翻译是 *clean slate*, 意为 “干净的记事板”) 进行词源考证时发现该词源自罗马语 “*tabula*” 实为 “笔记” (notes) 之意 (Smith 608-609)。以此为基础, 史密斯爵士指出, 人出生之时大脑如同一块干净的白板, 没有任何内容; 此后, 各种经验和感知被大脑记录并存储下来。大脑是经验与知识载体的观点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 (*De Anima or On the Soul*) 中指出, 大脑中已有知识信息的储备, 就像字母一样虽然没有被写到书写板 (*writing-tablet*) 上却已在我们的大脑之中, 这便是大脑运行的方式。¹ 针对大脑的记忆功能, 聂珍钊教授提出 “脑文本” 的概念并指出: “感知、认知和理解转化成记忆才能存储在脑文本里, 因此脑文本存储的是记忆” (聂珍钊 11)。史密斯爵士的大脑 “白板” 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大脑 “笔记” 说可用聂珍钊教授提出的 “脑文本” 的概念加以科学阐释甚至替代。

以聂珍钊教授提出的 “脑文本” 概念为依据, 可对殖民主义 “脑文本” 做出如下定义: 殖民主义 “脑文本” 是在殖民主义政治经济 and 历史文化影响下, 对殖民与被殖民经验和与之相关的殖民伦理的认同与记忆。英国后殖民作家及其文学虚构人物对殖民主义 “脑文本” 的反映、创造性回写和重写具有后殖民伦理道德拷问和反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功能。

论及后殖民语境下的大英帝国文化霸权, 比尔·阿什克罗夫特 (Bill Ashcroft) 等人指出: 尽管像其它 19 世纪殖民强国一样, 在国际事务中英国已降格为从属次要地位, 欧洲帝国列强已被美国超越, 然而就文学经典而言, 英国文学作品长期以来仍是品味和价值的试金石。古老的英国标准英语在广大后殖民世界依旧占统治地位 (Ashcroft 6-7)。在帝国文化霸权影响下的英国后殖民作家的创作面临着 “与帝国文化霸权妥协还是与其对抗?” 的问题。

英国后殖民作家及其小说主人公应对以殖民历史和文化记忆为内核的殖民主义 “脑文本” 的策略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对殖民主义 “脑文本” 的合理性不置可否, 前被殖民者及其后代面临如何重新审视殖民主义 “脑文本” 的伦理困惑; 二、认为殖民伦理 (或曰 “奴性”) 已成为被殖民者及其后代与生俱来的种族文化基因, 对殖民伦理的继承已成为前被殖民者及其后代在所在国家和地区去殖民化后无法实现种族解放与独立发展的作茧自缚的精神枷锁; 三、将殖民主义 “脑文本” 视为虚假的自我与种族身份的成因, 后殖民作家旨在通过重写英国殖民史和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方式达到重塑后殖民

1 Aristotle, *On the Soul*, Trans. J. A. Smith. <http://classics.mit.edu/Aristotle/soul.3.iii.html>

自我与种族身份的目的。重写英国殖民史和英国经典文学作品已成为英国后殖民作家抵抗殖民主义“脑文本”及隐含其中的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

一、流散者的混杂身份与伦理困惑

扎迪·史密斯 (Zadie Smith, 1975-) 的小说《白牙》 (*White Teeth*, 2000) 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英国而战的 45 岁的孟加拉移民萨马德在战争结束后面临着何去何从和“我究竟是谁?”的归属地与身份危机, 如他对英国战友阿奇·琼斯所说: “回孟加拉? 或是去德里 (印度城市)? 在那儿谁会需要像我这样的英国人? 去英国? 谁能接纳像我这样的印度人?” (Smith 112) 萨马德的身份与归属地疑惑源自其殖民主义思想中英国是母亲国, 殖民地人民是大英帝国子民的身份认同。以“帝国风驰号一代”为代表的从前英国殖民地, 如: 加勒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前往英国的有色移民在殖民主义“脑文本”的影响下展现出介于东、西之间的混杂身份。

哈尼夫·库雷西 (Hanif Kureishi, 1954-) 的小说《郊区佛爷》 (*The Buddha of Suburbia*, 1990) 中, 小说主人公印裔英国人哈伦的殖民主义“脑文本”表现为对圣雄甘地 (Gandhi) 等人的模仿。哈伦英国之行的本来目的是接受英国教育, 希望像甘地和真纳 (Jinnah)¹ 一样能以高贵的英国绅士形象重返印度。然而哈伦并未如愿以偿, 却成为为英国人所喜爱的“郊区佛爷”。以哈伦在伦敦郊区举办的系列“大师表演” (guru gigs) 和“佛教讲习班”为例, 透过诙谐幽默的反讽, 库雷西指出印裔穆斯林人哈伦为发财致富而将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移花接木般地混杂在一起。白天, 哈伦是一名为英国女王服务的英国公务员; 晚上, 哈伦则以“郊区佛爷”的神秘形象出现。虽然《白牙》中的萨马德和《郊区佛爷》中的哈伦具有相同的流散者身份; 然而, 不同于哈伦为追求经济利益和享乐, 迎合英国人的东方文化猎奇欲而将印度佛教与中国古典哲学混合炒作的行为, 萨马德仍心存延续种族历史与文化的道德责任。

面对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同化的压力, 如何保持和延续本种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这一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造成有色移民的伦理身份困惑。扎迪·史密斯指出, 千禧年来临之际英国政府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不过是刻意而为的假象。通过对基因科学家马库斯的“基因控制论”的描述, 扎迪·史密斯揭示了英国政府压制和消除有色移民异质文化的实际策略 (徐彬, “摩西十诫” 116)。“基因控制论”已成为战后英国消除异质文化, 强化有色移民心中殖民主义“脑文本”的有效措施。

1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Muhammad Ali Jinnah 1876-1948), 律师、政治家、巴基斯坦建国领袖, 参见 Akbar S. Ahmed, *Jinnah, Pakistan, and Islamic Identity: The Search for Saladin* (London: Routledge, 1997) 239.

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流散者不仅是来自前英国殖民地的移民，还包括以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 1912-1990）为代表的出生于前英国殖民地（印度）的英国殖民者的后裔。殖民主义时期，他们已被父辈灌输了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的“脑文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英国（裔）流散者身上却表现出因殖民与反殖民思想共存而引发的伦理身份危机，具体表现为：作为殖民者后代对殖民主义原则的认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对出生地或流散地风土人情的依恋以及对（前）被殖民者的同情。

以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为代表的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流散至英国殖民地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赋予文学创作强化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功能。与之不同，处于殖民与后殖民过渡期的劳伦斯·达雷尔在其文学创作中却表现出对英国殖民主义政治不置可否的心态，恰如达雷尔小说《芒特奥利夫》（*Mountolive*, 1958）中主人公芒特奥利夫 20 年前和 20 年后两次亚历山大之行，对英国殖民主义思想所持的态度由怀疑到坚持的转变。这一转变与达雷尔出任英国驻埃及、塞浦路斯、罗德岛等殖民地新闻官的经历密不可分。“英国殖民者”和“流散所到之处的市民或岛民”这两种身份的并存与矛盾导致达雷尔对其自身殖民主义“脑文本”和殖民伦理认同的模棱两可。

《芒特奥利夫》开始，初出茅庐的英国年轻外交官芒特奥利夫为学习阿拉伯语到达压力山大并暂住埃及科普特乡绅法尔陶斯·霍斯南尼家中。芒特奥利夫问及利拉为何将其选作情人时，利拉却流利地背诵了英国著名诗人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1870 年 2 月 8 日在牛津大学作的题为《帝国责任》的就职演讲中的一段文字（Durrell 29）。该演讲以宣扬大英帝国全球范围内殖民事业的伟大和帝国缔造者们的光辉形象为主题。可见，受过良好欧洲教育的利拉爱上的是大英帝国的文学和其中所塑造的崇高的英国殖民者形象，芒特奥利夫则是崇高的英国殖民者中的一员。听到利拉的回答，震惊之余，芒特奥利夫反驳道：“我们早已不再是那样的形象了，利拉”（Durrell 29-30）。此后，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描述恰似芒特奥利夫的内心独白：“这段文字好像这位科普特人发现并翻译了源于书本的荒诞离奇的一场梦（……）你能爱上一尊死去了的十字军士兵的石像吗？”（Durrell 29-30）

20 年前，以爱情为第一原则的芒特奥利夫尚且能对殖民主义“脑文本”业已过时了的现实进行客观评价；20 年后，作为首任英国驻埃及大使重返压力山大，以英国在埃及的政治权力为第一原则，芒特奥利夫却唤醒了内心压抑已久的现代十字军战士的殖民主义“脑文本”。达雷尔用芒特奥利夫的大使制服来形容规范、制约他的刻板的殖民主义伦理道德规约：“他的制服好似中世纪的锁子甲一样将他包裹其中，使他与世隔绝”（Durrell 131）。在殖民主义伦理道德的高压之下，芒特奥利夫无法挣脱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逾越东西方的鸿沟。

1945 年和 1953 年，劳伦斯·达雷尔分别前往英属罗德岛和英属塞浦路斯。

达雷尔的罗德岛之行带有鲜明的殖民政治色彩。英国政府任命达雷尔为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新闻发布官，其办公总部设在罗德岛。英国人塞西尔·托尔的专著《古代罗德岛》是达雷尔在罗德岛上的殖民主义“脑文本”的来源。以此为基础，达雷尔预设了罗德岛上英国殖民者与罗德岛岛民和在罗德岛工作的希腊人、土耳其人之间的殖民主义伦理关系。游记《海上维纳斯的思考》（*Reflections on a Marine Venus*, 1953）中，达雷尔广泛涉及罗德岛被殖民的历史，并表现出“复活”十字军殖民意识的写作动机。担任新闻官的达雷尔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调解人”、立法者和名不见经传的圣贤，他肩负着让手下的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听从指挥，和睦相处的责任（徐彬，《劳伦斯·达雷尔研究》147）。游记中，达雷尔对希腊人、土耳其人乃至意大利人的丑化，颇有殖民主义“脑文本”中“大英帝国中心论”的嫌疑。

不同于1945年达雷尔在罗德岛上的殖民主义“脑文本”的明确无误的现实指涉，游记《苦柠檬》（*Bitter Lemons*, 1957）中，1953年英属塞浦路斯之行却使达雷尔因塞浦路斯岛民和英国殖民地官员双重身份而陷入“究竟为谁服务和为谁写作？”的伦理两难之中。为文学创作放弃南斯拉夫英国领事馆工作，初到塞浦路斯的达雷尔希望定居塞浦路斯成为一名普通岛民。以在塞浦路斯买房为例，达雷尔热情地讴歌了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种族关系；此后，身为英国驻塞浦路斯新闻官的达雷尔对被卷入意诺西斯运动的塞浦路斯居民深表同情，对自己美好塞浦路斯生活的结束深感遗憾。达雷尔对塞岛生活的热爱和对塞浦路斯岛民超越种族与国别的信赖与其对英国塞岛殖民政治的批判形成鲜明反差；因服务英国政府和同情塞岛居民而产生的伦理困惑可见一斑。

二、殖民主义“脑文本”固化的焦虑

英国著名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在其作品中展现出对20世纪50年代南非独立后，人口占少数的南非白人因坚守殖民主义种族伦理关系而引发的政治危机与种族焦虑。1652年南非成为荷兰人的殖民地，1815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34年南非宣布独立。从1652年至1934年，长达282年的被殖民历史已使欧洲白人殖民者与被殖民的南非黑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种族伦理关系成为南非白人与南非本土黑人世代以来内化于心的殖民主义“脑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文学作品，莱辛意在指出：固化了的殖民主义“脑文本”贻害无穷，如不及时消除，独立南非的种族与社会秩序将重蹈殖民主义政治的覆辙，并进而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非洲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的受害者。

在旅行散文集《回家》（*Going Home*, 1957）中，莱辛探讨了产生于南非殖民主义时期至20世纪后半叶流通于英国白人、南非白人和非洲黑人三类人群中的殖民主义“脑文本”，表现为南非境内的种族隔离、英国境内的种

族歧视和南非本土黑人对欧美白人的无条件顺从。

以伦敦热带病医院（Tropical Disease Hospital in London）里白人中年妇女将黑人医生和病人视为容器裂缝里寄生着的病菌而高度神经紧张的事件为例，莱辛指出：英国境内的种族歧视已发展成英国白人所患的神经官能症，如同患有精神病的人一样，持种族歧视心态的英国白人才是应该受到同情的对象（Lessing 13）。

后殖民时期，南非白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仍占统治地位；尽管如此，他们却是受殖民主义“脑文本”毒害最深的人。南非白人与黑人经济上的高低贵贱关系进一步强化了隐含于殖民主义“脑文本”中的种族伦理。进入后殖民时期，殖民伦理的遗毒从政治、文化领域延伸到工业经济领域，南非白人政府通过限制南非黑人经济活动场所的方法控制其思想行动。令莱辛倍感焦虑的是：像诸多跑步机上的小白鼠一样，南非白人生活在一个日渐狭小、令人窒息的笼子里；非洲黑人则被引导进入工业领域，从事工业劳动的非洲黑人与欧洲文明的精华绝缘。非洲黑人仅被告知什么是坏、什么是愚蠢。在遭受白人工业化剥削的同时，南非黑人逐渐丧失了他们丰富的文化遗产（Lessing 14）。

透过莱辛小说《野草在歌唱》可以看出，以摩西为代表的受过西方基督教教育的部分南非黑人业已认识到南非黑白种族不平等的现实。迪克家庭生活中白人与黑人主仆权力关系的逆转，即：摩西虽身为仆人，却因迪克和玛丽对他的依赖而获得了家庭生活的主导权，成为南非黑人凭借其身体和劳动力优越性抵制殖民主义种族伦理关系的典型案例。因迪克农场破产，摩西被解雇后对玛丽的复仇和束手就擒后被绞死的结果是被剥夺权力的摩西暴力反抗后的无奈选择。实际上，就莱辛而言，大多数非洲黑人因知识、眼界所限对殖民主义“脑文本”均持自我安慰的消极接受态度；如莱辛所言，“面对白人的种族压迫，非洲黑人以快乐、幽默和乐观的态度展示出其人种的优越性”（Lessing 14）。莱辛认为，绝大多数南非黑人并不具备摩西的反抗能力，表现出逆来顺受的形象。白人优于黑人、白人优先的观念深入南非黑人的思想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殖民时期南非黑人的被奴役状态与南非黑人对殖民主义“脑文本”的集体无意识的认同密不可分。

凭借“是什么导致英国白人非洲的美国化？”（Lessing 51）的发问，莱辛指出南非的美国化进程从经济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了殖民主义“脑文本”对南非黑人的控制。小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美国价值观的普及消除了种族、阶级的差异，财富占有者即是国家、社会的合法统治者。占有绝大多数的南非财富却占人口少数的南非白人在美国价值观体系中被再次神话。

在圣基茨裔英国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 1958-）的游记《大西洋之声》（*The Atlantic Sound*, 2000）中，殖民主义“脑文本”的固化在篡改黑奴贸易历史、谋求现实利益的非洲黑人无罪妄想症患者的身上得以

体现。在与加纳前文化部高官和著名剧作家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教授 (Dr Mohammed Ben Abdallah) 的访谈¹中, 卡里尔·菲利普斯发现殖民主义“脑文本”以“泛非节”为表征的文化宣传的方式得以固化, 围绕“泛非节”开展的一系列庆祝和商业活动消除了加纳人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将自己的同胞贩卖给欧洲奴隶贩子的历史负罪感。“泛非节”上, 加纳人与“返回非洲”的非裔流散者做起了“回家”的生意。“泛非节”与奴隶堡的商业化运作是加纳人的生财之道。加纳文化部的官方宣传、非裔流散者“泛非节”上的狂欢和加纳人祖先罪恶的奴隶贸易史遥相呼应。对昔日关押黑奴的奴隶堡的内部改造并非以再现昔日黑奴受难场景和对今人进行历史教育为目的。通过对关押女黑奴的奴隶堡房间的描述, 卡里尔·菲利普斯指出奴隶堡实现了从历史教育素材到可供贩卖的商品的功能转变。这一转变恰是后殖民时期在殖民主义“脑文本”影响下, 加纳人与(前)殖民主义者共谋关系的表现。

三、从被动记忆到主动反击: 殖民主义“脑文本”的后殖民重写

作为被殖民者的后代, 加勒比英语作家乔治·拉明 (George Lamming, 1927-)、奈保尔 (V. S. Naipaul, 1932-2018) 和卡里尔·菲利普斯均被迫接受了英国的殖民教育; 然而, 英国殖民教育给他们输入的殖民主义“脑文本”并未使两位作家成为法农所说的因缺乏文化根基, 自感低人一等而向殖民宗主国文化投怀送抱的“黑皮肤, 白面具” (Black Skin, White Masks) 的人。相反, 三位作家从种族伦理视角出发, 成功实现了对英国文化和经典英国文学作品的后殖民重写。“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上述作家的后殖民重写实现了对英国殖民教育从被动记忆到主动反击的态度转变。

奈保尔的小说《半生》 (*Half a Life*, 2002) 和《魔种》 (*Magic Seeds*, 2004) 中, 主人公父子两代人皆因无法摆脱殖民主义文化、文学记忆的“脑文本”的桎梏而导致生命意义的缺失。奈保尔讲述了主人公威利的父亲、威利及其妹妹沙拉金尼两代人受殖民主义“脑文本”的影响而向西方“自我献祭” (self sacrifice) 的故事。威利父亲对殖民主义“脑文本”的认同和与以英国作家萨默塞特·毛姆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 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者的共谋恰如威利写作的寓言故事中饥饿的婆罗门僧侣为生存和荣华富贵与魔鬼之间的交易, 即: 只要每年向魔鬼献祭童子, 便会得到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金币; 交易的最终结果却是婆罗门僧侣的一双儿女成为魔鬼的祭品。通过故事, 奈保尔建立了魔鬼与帝国文化霸权、婆罗门僧侣与威利父亲、金币与威利父亲的灵修院、婆罗门僧侣的儿女与威利和沙拉金尼之间一系列能指与所指的寓言式对等关系。

1 阿卜杜拉教授讲述的黑奴贸易史中, 关押、贩卖黑奴的奴隶堡被美化为国王和王后居住过的宫殿和教会学校给非洲学生上课的地方; 非裔流散者是被放逐他乡以示惩戒的非洲罪犯的后代, 是不属于非洲大陆的外来部落。参见 Caryl Phillips, *The Atlantic Sound*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1) 148

威利父亲与萨默塞特·毛姆之间的共谋关系恰如寓言故事中饥饿的婆罗门僧侣与魔鬼签订的契约，契约的本质是对殖民主义“脑文本”的认同。寓言故事的题目“生命的牺牲”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威利父亲屈服于魔鬼（帝国文化霸权）的金钱诱惑出卖良心从而导致自己和儿女成为西方傀儡，两代人皆一生一事无成，抱憾终生。

现实生活中，印裔英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与奈保尔小说中威利的父亲相似，同样是受殖民主义文化、文学记忆的“脑文本”所束缚的人。在自传回忆录中，拉什迪拉开时空距离客观审视自我，对年仅13岁的小男孩（拉什迪本人）主动提出离开父母前往英国的决定提出如下疑问：

“小男孩为何要将一切抛之脑后，旅行半个世界去那个未知的国度，远离爱他的人和熟悉的事？难道是（英国）文学在作怪（毫无疑问他是个书虫）？（……）换句话说，这是不是一个幼稚的决定，前往一个仅在书本中存在的、想象的英国去探险？”（Rushdie 27-28）对年轻的拉什迪来说只有去英国才能远离单调乏味的印度生活，实现在阅读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英国梦。

受英国文化、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拉什迪被批评家们称为“第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Brennan viii）。言外之意，拉什迪对第三世界故事的后现代化叙事虽实现了世界主义的思想阐释，却解构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认同感。移民英国，以放弃对本国和本民族的支持和认同为代价，年轻的拉什迪完成了对英国文化和文学的朝圣。在文学创作中，拉什迪妖魔化印度和印度人民的作法与奈保尔小说中威利的父亲出卖灵魂的“生命的牺牲”如出一辙。

实际上，许多后殖民作家已经意识到因对殖民主义“脑文本”的认同而导致的“生命的牺牲”的悲剧性后果，并试图采取相应策略加以避免。在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影响下，如何反其道而行之，重写殖民主义“脑文本”已成为部分英国后殖民作家文学创作关注的焦点。

1950年，乔治·拉明离开巴巴多斯前往英国伦敦，从那时起乔治·拉明心中便萌生了背叛故乡的羞耻感。此后，虽佳作不断，其负罪感仍难释怀，恰如拉明在半自传小说《冒险季节》（*Season of Adventure*, 1960）里《作者附言》（“Author's Note”）中所写：“把我自己说成‘生为农民，受殖民教育的殖民地人和天生是个叛徒’毫不过分”（Drayton ix）。如何在帝国的中心伦敦回写故乡加勒比并由此实现政治文化层面上的自我解放和民族、国家解放？以及，如何从“受殖民教育的殖民地人”转变成独立自主的加勒比人？是乔治·拉明文学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乔治·拉明的散文集《流放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Exile*）出版于1960年。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政府在印度尼西亚组织召开的万隆会议，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与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新的殖民主义的呼声在万隆会议上得到抒发。万隆会议的召开为理解《流放的快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历史语境。被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民族与

国家日益高涨的独立意识所触动，乔治·拉明将在英国殖民主义教育体系下习得的英国文学记忆的“脑文本”，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The Tempest*, 1610-1611）反其道而用之，在“复活”卡利班（Caliban）和普洛斯彼罗（Prospero）的基础上，乔治·拉明颠覆了普洛斯彼罗的魔法权威，逆转了二者间的主仆关系。理查德·德雷顿认为：“离开加勒比，卡利班（乔治·拉明）摆脱了强加于其身上的文化角色。（……）在殖民者普洛斯彼罗的小岛（英国）上，他（卡利班/乔治·拉明）获得了老魔法师（普洛斯彼罗）对加勒比和更广阔世界的权威”（Drayton x iii）。

就生活与教育背景而言，卡里尔·菲利普斯同样是前殖民宗主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的被动接受者。英国白人主导的文化和文学通过屏蔽英国黑奴贸易和英国黑奴史的方式对以卡里尔·菲利普斯为代表的英国黑人实施了类似殖民主义的精神控制。1958 年仅 4 个月大的卡里尔·菲利普斯随父母从圣基茨移民英国，定居英格兰北方城市利兹。卡里尔·菲利普斯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79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不满于对殖民文化和文学知识的学习，卡里尔·菲利普斯凭借近乎虚无主义的史学观¹向以《呼啸山庄》为代表的英国经典文学中种族叙事的伦理道德合法性发出挑战，以文学创作的方式重写了西方世界或避而不谈、或浅尝辄止、或刻意歪曲的奴隶贸易史以及延续至今的历史与社会影响。

在 2009 年拍摄的极具争议的纪录片《一个普通黑人》（*A Regular Black*, 2009）中，担任评论员的卡里尔·菲利普斯开诚布公地揭示了艾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1847）中隐而未发的有关 18 世纪英国奴隶贸易、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等主题，指出艾米丽·勃朗特创作《呼啸山庄》的时期约克郡英国白人家中拥有黑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 2015 年出版的小说《迷失的孩子》（*The Lost Child*）中，卡里尔·菲利普斯否定了艾米丽·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给出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吉普赛小男孩或爱尔兰人之子的身份定义。以制作纪录片《一个普通黑人》中的调查研究和 18 世纪末利物浦奴隶贸易的史料为依据，卡里尔·菲利普斯将希斯克利夫的身份重新定义为恩肖先生与被贩卖至英国利物浦的刚果女黑奴的私生子。

如将以《呼啸山庄》为代表的英国白人作家创作的经典作品视为卡里尔·菲利普斯被动接受的殖民主义“脑文本”，菲利普斯对希斯克利夫身份的重新定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呼啸山庄》的前传式回写则可被视为菲利普斯对殖民主义“脑文本”的颠覆与反抗。

1 在与张和龙教授的访谈中，卡里尔·菲利普斯指出：“由于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原因，我从不相信我被教授的英国历史。（……）对我而言，小说可被视为另一种历史，另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希望这一方式更能吸引读者”。参见 Zhang Helong, “An Interview with Caryl Phillip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11, Vol. 3, pp. 1-7) 3.

纪录片《一个普通黑人》和小说《迷失的孩子》均可被视为英国后殖民作家重写殖民主义“脑文本”的典范。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所写：“没有他者的历史就没有英国历史”（Procter 82），卡里尔·菲利普斯的创作动机是真实再现和放大他者的历史并将其重新写入英国文学，使其成为英国文化与文学的“英国性”中不可或缺的“他者”元素。

吉娜·怀斯克（Gina Wisker）将多米尼加裔小说家简·里斯在《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 1966）中对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经典小说《简爱》（*Jane Eyre*, 1846）中女主人公伯莎（Bertha）故事的重写视为对“殖民主义版本的历史”（colonial versions of history）的重写与反拨（Wisher 60-61）。以此为依据，可做出如下判断，即：简·里斯和卡里尔·菲利普斯的作品是对勃朗特姐妹作品中刻意遮蔽了和扭曲了的特定时期英国殖民历史记忆、记录（或曰殖民主义“脑文本”）的揭露与批判。

与比尔·阿什克罗等人提出的“被殖民者或前被殖民者的英语写作即是反抗殖民主义的后殖民创作”（Ashcroft 38-39）的观点不同，W. H. 纽（W. H. New）认为：后殖民的内在矛盾是“抵抗行动本身也是认同，尽管只是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承认”（New 18）。英国后殖民文学与殖民主义“脑文本”密不可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后殖民文学是殖民主义“脑文本”的产物。英国后殖民作家与殖民主义“脑文本”之间存在“反映”、“共谋”和“抵抗”三种关系。英国后殖民作家认为，习得与承认殖民主义“脑文本”是一种生存手段和身份认同方式。然而，对殖民主义“脑文本”无条件的继承却使（前）被殖民者深陷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泥潭。英国后殖民作家对殖民主义“脑文本”的抵抗并非对现存殖民主义“脑文本”的确认，而是对蕴含其中的殖民与种族主义伦理道德的批判与否定。

Works Cited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Brennan, Timothy.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9.
- Drayton, Richard. "Taking back the head: The Pleasures of Exile Viewed from the Caribbean." *The Pleasures of Exile*. George Lamming,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 Durrell, Lawrence. *Mountolive*. New York: E. P. Dutton, 1961.
- Lessing, Doris. *Going Hom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76.
- New, W. H. *Land Sliding: Imagining Space, Presence, and Power in Canadian Writing*.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7.
- Procter, James. *Stuart Ha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Rushdie, Salman. *Joseph Anton A Memoir*. London: Vintage Books.

Smith, William, Cornish, F. Warre, ed.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London: Spottiswoode and Co. 1898.

Smith, Zadie. *Whit Teet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Wisher, Gina.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口头文学与脑文本”, 《外国文学研究》6 (2013): 8-15。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3): 8-15.]

徐彬: “‘摩西十诫’与‘掉牙’的焦虑——〈孤独的伦敦人〉与〈白牙〉中英国有色移民的种族危机”, 《外语与外语教学》1 (2019): 110-118。

[Xu Bin. "Ten Commandments and The Anxiety of Losing Teeth: British Colored Immigrants' Racial Crisis in The Lonely Londoners and White Teeth."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 (2019): 110-118.]

徐彬: 《劳伦斯·达雷尔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

[Xu Bin. *Lawrence Durrell Studi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